

中国共产党 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洪认清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33486

A851.692
02

中国共产党

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洪认清 著



北航

C1722041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851.692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洪认清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15-4891-2

I. ①中… II. ①洪…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012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6.25 插页:2

字数:283 千字

定价:32.00 元



北航

C172204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端	1
第一节 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传播	1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形态	32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53
第一节 毛泽东对史学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指导	53
第二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阐发	63
第三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76
第三章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88
第一节 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论述	89
第二节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97
第四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104
第一节 江泽民对历史教育理论的创新	104
第二节 江泽民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	117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中国共产党的史学理论创新	132
第一节 胡锦涛关于历史学习问题的新阐释	132
第二节 胡锦涛对历史经验的运用及对历史智慧的汲取	135

第六章 苏联史学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	140
第一节 延安时期苏联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	140
第二节 苏联史学的输入与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	152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指引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的方向	165
第一节 20 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路径	165
第二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域特色的形成	176
第三节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史学界的学术创新	187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历史教育的创新	198
第八章 中共历史学家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问题的理论探索	
——以刘大年、胡绳、龚育之为例	203
第一节 刘大年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问题的思考	203
第二节 刘大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化问题的探索	214
第三节 胡绳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观	225
第四节 龚育之对中共党史学术创新问题的理论探索	235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247
后 记	257

第一章

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端

第一节 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 对唯物史观的传播

吕振羽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从五四运动前后开端”。^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 20 年代,李大钊、李达、蔡和森、陈独秀、杨匏安等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宣传。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一、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系统传播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者之一。1919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唯物史观是介绍的重点。从 1920 年起,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等校

^① 吕振羽:《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40 页。

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史学思想史》讲义中,他系统地评述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如鲍丹、鲁雷、韦柯、孟德斯鸠、孔道西、圣西门等人的历史思想。以此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以往人类先进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阐述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的任务,为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著,尝试用唯物史观“改作旧史”。

(一)唯物史观的内涵及其对于社会科学进步的贡献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①

李大钊首先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内涵:“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它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它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它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②在这段文字中,李大钊较系统大致准确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只不过他也认同“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显示出其认识的局限性。

李大钊特别强调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离开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9、20页。

了马克思“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①。就是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石。

李大钊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思想渊源，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首创，而是由孔多塞开启端绪：“自孔道西(Condorcet 即孔多塞)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②李大钊较全面地分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孔多塞、圣西门、梯叶里、米涅基佐、蒲鲁东等人的历史唯物论的渊源关系，指出其共同点是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

在阐述历史唯物论者共同观点的基础上，李大钊进而阐述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历史观的纲要，始见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的历史观，则在他1859年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李大钊根据日本学者河上肇所译《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的日文译本，将其唯物史观部分择要译成中文。进而“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③李大钊总结唯物史观的大致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它每个进化的程级，为它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④

李大钊细致地叙述了唯物史观的两个要点：

唯物史观的第一个要点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李大钊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8～19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0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7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1页。

将社会经济的构造称为“社会的基础构造”，将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等“精神的构造”称为“表面构造”。认为“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它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它以影响，它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它的行程”。唯物史观的第二个要点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与布帛菽粟一样，社会关系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李大钊举例说：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①

李大钊全面论述阶级斗争说唯物史观的密切联系：与唯物史观密切相连的，是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马克思“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就是说，阶级竞争是经济的原因引起的。李大钊同时又指出：马克思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②。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关于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马克思也有自圆其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7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9、28、30页。

级的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也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李大钊认为:“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①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有小小的瑕疵,但不能掩盖其莫大的功绩。唯物史观对于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马克思特有的唯物史观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②

胡绳评价说: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学说。显然这篇文章仍包含着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刚从急进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过来而难免带有的思想渣滓,例如文中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③

(二)唯物史观的学术源流和社会科学价值

《史学思想史》是1923年9月至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的正式课程,《史观》系该课的第一讲,系统讲授了从古代神道史观到近世“马克思诸子”唯物史观的发展演变历程。李大钊指出,古代的历史观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联系。“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0、31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1、21页。

③ 《胡绳全书》第三卷(上),第351页。

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从康德开始，唯物史观开始发展。^①

李大钊叙述博丹、勒卢阿、圣西门对唯物史观发展的贡献：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史学家鲍丹^②（今译博丹或波丹）的历史观，有三大特点：“于后来进步论的发长上，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他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他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他认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关系。”“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原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③就是说，博丹的历史观蕴含着唯物史观萌芽的因素。鲁雷（今译勒卢阿）的历史思想对于史学上的贡献，有三要点，全与鲍丹相同。法国史学家桑西门（今译为圣西门）的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④圣西门的经济的历史观发展了唯物史观。

1924年李大钊著《史学要论》论述了唯物论历史观两个派别的学术分野：唯物论的历史观，一派是海尔革（即海克尔）及席克等的进化论派，另一派是马克思及恩格尔（即恩格斯）辈的经济学派。“海氏著有《自然的发展上的文化史》（1875年），席氏著有《古代世界衰亡史》（今已出至五卷，1894—1913年），都以生物学上的根本法则解释历史。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史学贡献在于：“这样子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⑤

李大钊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第一卷的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52、253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81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81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19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31页。

《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李大钊指出,马克思阐述了“历史”、“社会”两种概念的关系。按马克思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用建筑来比喻,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经济关系的变动说明上层建筑的变动,认为“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李大钊总结指出,马克思历史观的要点是:“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氏的意思,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①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以经济史概历史学的全般。”李大钊认为以此来责难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实有商榷的余地。“马氏认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马氏虽认上层的变动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但绝不是把社会构造的整个全体,裂为零碎的东西,而以基址概全构造,以经济史概全文化史,概全历史学。我们承认历史学是各个特殊的历史学的总合,同时亦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构造中是其基址,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②李大钊的这段文字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概括历史学的全貌,而不仅仅指经济史。

对于唯心史观的历史哲学,李大钊也有客观的评述。李大钊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分析比较了李凯尔特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学术异同。理恺尔,今译李凯尔特(1863—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在文中指出,李凯尔特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凯尔特哲学思想中,历史哲学占重要地位,其突出特点为形而上学的性质,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认为历史领域内一切都是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28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37、338页。

个别的,是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规律性。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认为它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的产物。可见,李凯尔特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有重大的学术分歧,但同时李大钊又指出二者存在的学术的关联:“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①

李大钊指出,历史观总的发展趋向是:“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观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己的,是含有进步性的。”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李大钊举例说明新旧历史观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解释是不同的:“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②

由于唯物史观的发展,历史学开始向科学化迈进。李大钊指出,从康德等人开始期望发现历史法则,“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就是说,唯物史观对于促进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科学化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32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54页。

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①德国“西南学派”又称“巴登学派”、“弗莱堡学派”或“海德堡学派”,其创始人是新康德主义者维尔海姆·文德尔班(1848—1915)。甚至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学科与文学是相似的。德国“西南学派”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影响很大,但是仍然不能动摇历史学的科学位置,李大钊分析其原因,认为这应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

(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920年1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1924年发表的《史学要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现代史学价值。

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还是用“经济史观”一词表述更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仍之不易”。^②

从前对历史的宗教解释、神学解释、政治解释等都是唯心的解释,这些解释“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旧的历史的解释方法带给读者的是颓废的人生观。旧的历史的解释方法对于“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③。

唯物史观的解释方法,则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唯物史观方法“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53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16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18、219页。

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李大钊由此认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截然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①

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大史学影响:“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因为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的历史观影响,亦渐知就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考。依他们的主张,于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现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所异。”“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费[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②

李大钊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在史学界的重要影响,“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那些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唯物史观的影响。^③

李大钊提出依据新的历史观重新书写历史:“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他举例说:“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历史不少。”李大钊进而提出:“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④

(四)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及其人生观意义

李大钊论述了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就是说,经济现象是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19、220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29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21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54、255页。

“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它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他举例说，“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它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但“因为它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它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的史观”。^①

李大钊梳理唯物史观的发展脉络：“唯物史观自鲍丹(Bodin)辈出，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 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梯叶里、基左等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条、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蒲鲁东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也有贡献，他“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键，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李大钊赞扬马克思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伟大功绩：“至于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②

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它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它每个进化的程级，为它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马克思认为这个最高动因是“物质的生产力”。例如，“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③

李大钊列举的事实，证明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观察社会现象是合理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具有重要价值：“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39、340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40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41页。

出来它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美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①

李大钊在大学生中宣传唯物史观,将历史观与人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论述,激励大学生沿着唯物史观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创造新的人生。1923年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题为《演化与进步》的演讲,他指出:“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他鼓励青年以进步的历史观为指导,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②

1923年李大钊在复旦大学作《史学与哲学》的演讲,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他以为社会上、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所以以经济为主点,可以解释此种现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命)种新的人生观。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③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价值重大,对人生观影响显著,因此“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李大钊呼吁大家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④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41、342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157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164、165、167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21、222页。